

第一 部 分

背景：研究者的故事



第一章 绪论

“从中国来到美国学习就像是去西天取经——困难重重。”

——摘自 4 位中国留学生之口

对于中国大陆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到美国留学是他们终身梦寐以求的事情，而且被视为人生一大成功。但是，在他们克服重重困难终于来到美国以后，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突然落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上以后，他们有什么想法和感触呢？他们来自一个文化传统与美国文化完全不同的国度，对“自我”、“他人”、“人我”和“人际关系”这些概念的理解和美国人有什么不一样呢？作为“客人”，他们来到美国以后是如何和东道国的“主人”建立人际关系的呢？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美国社会人际交往的规范，并且调整自己原有的行为模式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的呢？更重要的是，他们在跨文化人际交往方面的经历对他们个人的自尊和文化认同感有什么影响？他们在与不同文化的人们接触的过程中是如何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我定义的呢？——正是这些问题激发了我的兴趣，促使我选择中国留学生在美人际交往这一课题做我的博士论文。

本课题使用的是质的研究的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①。在一年的

有关“质的研究”的定义、历史发展、理论基础和操作方法，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研究方法的选择”。

时间里，我对 9 名中国留学生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追踪调查。1992 年夏天我来到中国大陆，与即将赴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取得了联系，然后通过开放型访谈、参与型观察和非正式交谈等方式了解了他们在中国交友的情况。1992 年秋天我随这些中国学生来到美国波士顿地区，追踪他们 8 个月，对他们来到美国以后和美国人交往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这部分研究使用的方法包括：访谈、观察、文献分析和个案调查。研究的路线是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上展开的。横向研究涉及到这些留学生在跨文化人际交流中的知觉、态度、价值观念、行为规范、互动方式、沟通特征以及人际冲突的调适；纵向研究着重考察他们来到美国以后 8 个月内与美国人交往的过程以及他们自己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发生的变化。此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在中美两种文化的撞击和交汇之中，中国留学生如何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建立人际关系，如何在这个过程中重新建构他们自身的文化角色和人际交往模式，以及这种建构对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产生了什么影响。通过纵横两方面深入的考察，我试图从理论上探讨文化对个体的自我概念和人我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跨文化人际交往对个体自我文化身份的重新建构。

我选择这个题目作为研究的重点是因为我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在当前十分重要。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虽然国内对他们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的情况有所报道，但是尚没有人对他们的跨文化人际交往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众所周知，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很多差异，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以后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强烈的“文化冲击”。他们在生活中其他方面遇到的困难（如学业和经济问题）可以通过学校或自己的努力得到一些缓解，而人际关系对他们来说却是最为头疼的一件事情。人际关系在他们的生活中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如何按照本地人的行为规范与人交往是一个每天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尽管美国很多大学都设立了外事机构为外国学生服务，但这些机构的职责更多的是帮助外国学生解决生活中一些具体的问题，如找房子、找工作、提高英语写作水平等。这种机构很难帮助中国学生和美国人进行深入的个人交往。

此外，人际交往方面成功与否直接影响到中国留学生对美国以及美国人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他们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如果他们和美国人的人际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他们的情绪会比较高昂，学业上会表现得比较主

动，对学校组织的社交活动也会比较热心。相反，如果他们和美国人交往很不顺利，他们往往会情绪低落，上课无精打采，对学校组织的活动也没有什么兴趣。因此，对中国留学生的人际交往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有关人员对留学生的交往心态加以注意，采取相应的措施帮助他们进行调整和适应。此外，这类研究还可以帮助中国留学生了解自己的行为方式和情感倾向，从而调整自己在异文化环境下的学习和生活。

除了适应异文化环境的需要，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跨文化人际交往对他们自己的自尊和自信也有很大的影响。由于中美两国在国际政治和经济上的相对地位，中国留学生一般都比较看重自己和美国人之间的交往。对他们来说，与美国人交往不仅仅是一种生存需要，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能够和美国人建立深入持久的关系表明自己具有在一个异文化（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是一个更加“先进”的文化）环境中生存的能力，而与美国人没有交往则意味着自己“无知”、“无能”。中国留学生来自一个以群体为中心的社会环境^①，个人比较看重外界对自己能力的评价。如果他们在与美国人交往时显得“无能为力”，他们便很容易对自己的社会交往有效性产生怀疑，从而对他们自己的能力也失去信心。因此，我希望透过中国留学生与美国人交往的具体活动，考察他们在跨文化环境里是如何重新调整自己的自尊和自信的。

我选择跨文化人际交往作为研究中国留学生的切入点，还因为他们在这方面的经历和感受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中国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无时无刻不在受到异国文化的挑战。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感到惴惴不安，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美国社会的规范，也不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以达到本地人的预期。因此，他们常常受到理解和误解、满足和失望、融合和冲突这些对立形态的冲击和推拉。由于在空间上和自己的母文化拉开了一定的距离，同时日常生活中又天天受到美国文化的强大冲击，他们开始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反省和思考。他们开始考虑自己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中国人在人际交往方面有哪些特征？这些

^① 有关中国文化到底属于“集体主义”（collectivism），还是“个人主义”（personalism），学术界有很多争论〔在这里，“个人主义”有别于“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本章文献综述部分将对这一点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为了绕过这种争议，我决定在本书中使用“群体中心”或“群体本位”这类词语来表示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倾向。

特征和美国文化有什么不同？这种不同对他们个人的文化身份和情感归属有什么意义？当他们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发现自己的行为在不知不觉之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对自己的变化感到既吃惊又惶恐，不知道自己是否仍旧是“中国人”？是否有必要一定要坚持做原来意义上的“中国人”？在异文化环境中保持不变是不是可能？在新的文化环境里如何既坚守自己原有的信念又同时习得适应新生活的能力？在面临价值冲突时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一般来说，中国留学生们在美国文化的撞击下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文化认同危机”。因此，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了解他们在跨文化交流中是如何处理这一危机，如何在新的环境里重新构建并定位自己的文化身份的。

我选择这个题目还和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兴趣以及关切的问题有关。从我个人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以及我对其他中国留学生的了解，我发现中国留学生要在留学初期和美国人建立深入持久的人际关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美国学习的初期，我个人在这方面经受了挫折，因而也思考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在这个挣扎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对中国的文化及其对我们个人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同时也对美国的人际交往模式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内蕴加深了理解。在这个了解和思考的过程中，我常常体验到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既感到伤心失落又觉得好奇兴奋。我所遇到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谈到了这种在和美国人交往时所感到的既尴尬又有趣、既悲哀又喜悦、既在心理上感到焦虑又在思想上备受启示的奇妙感受。因此，我希望通过这项研究了解中国留学生在这方面的深层体验，再现他们初到美国时精神上的惶惑、惊诧、顿悟和升华。

第一节 研究背景

本研究课题所涉及的领域包括中国学生留美史、人际关系理论、中美人际交往模式比较、跨文化交流理论以及留美中国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下面我将就学术界在这五个方面所作的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从而揭示本研究在这些领域网络中所占的位置及其独特性和重要性。对中国学生留美史的介绍是为了使我们对中国学生过去在美国留学的情况有所了

解，在历史的观照下看待今天的留学生。对人际关系理论进行探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留学生来到异国他乡后对人际交往方面的心理需求和行为倾向。中美人际交往模式比较研究从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 interpersonal behavior 进行了对照，可以使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对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以后的经历和感受进行探讨。跨文化交流理论介绍了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彼此进行交流的一般模式，可以帮助我们对中国留学生在与美国人交往时所遇到的障碍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对留美中国学生人际交往方面的调查进行回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人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从中映衬出本研究的意义所在。社会科学工作者们目前在以上五个领域都做了很多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为本课题提供了一个广阔而又有发展前景的研究背景。

本节中所介绍的“研究背景”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文献综述”不太一样。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质的研究方法，研究的路线是从下往上，而不是从上往下。也就是说，研究者是从自己收集的原始资料出发，进行分析整理后，在原有材料的基础上建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①。介绍“研究背景”的目的不是为了给本研究提供一个理论框架，然后按照这个框架从原始资料中挑选一些佐证来验证研究者本人预定的假设。对前人的理论加以介绍是为了给本研究提供一个背景框架，标示本研究在所涉及的领域网络中的地位，同时帮助研究者深入分析原始资料，为在抽象层面建立“扎根理论”提供参考。

一、中国学生留美史

中美教育交流始于 19 世纪中叶。1847 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罗宾·布朗（Rev. Samuel Robin Brown）将容闳及另外两位中国青年带到了美国学习（勒法格，1980）。容闳于 1864 年在耶鲁大学本科毕业后回到中国。在随后的 8 年里，他不遗余力地试图说服清朝政府派遣学生去美国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政治思想。在 1872 年到 1881 年间，清朝政府在美国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的哈特福德市（Hartford）建立了中国教育署。在这段时间里，共有 120 名中国学生被派到美国学习军事技术、造船业、数学和制造业。然而，由于宫廷内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将这一教

^① B. Glasner & A. Strauss,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 Chicago: Aldine, 1967.

育计划看做是用洋人的风俗和礼仪毒害中国青年，中国教育署于 1881 年被解散，很多学生尚未完成学业便被遣送回国。

1908 年，美国政府决定将中国政府支付的庚子赔款 1200 万美元归还给中国，但条件是中国必须将这笔钱用于选派留学生去美国学习（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1974）。中国政府用这笔钱在北京建立了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为即将赴美的学生提供必要的语言和礼仪训练。在 1912 年到 1924 年间，总共有 1600 名中国青年赴美深造。1924 年，美国颁布了新移民法，这个法令对中国留学生身份的定义和居留条件都十分苛刻（王奇生，1992：25）；中国的北洋政府愤而通令全国各省停止派遣官费留美学生，以示报复。后来，由于各国留学生的齐声反对，美国政府特许放宽对学生入境的限制，北洋政府的通令也宣布取消。到 1925 年，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人数上升到 2500 人，占各国留学生总数的 1/3，居 97 国之首（王奇生，1992：25）。

1925—1928 年间，留美中国学生人数基本上保持在 2500 人上下。可是，从 1929 年开始，留美学生人数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美国经济危机导致大学吸收外国学生的能力下降；第二，清华庚款停止大批选送学生出国；第三，南京国民政府的留学制度比北洋政府时代渐趋正规化。1929 年，中国留美学生的人数降到了 1279 人（王奇生，1992：27）。1933 年，由于美元贬值，中国留学生人数开始回升，到 1937 年，留美中国学生又增至 1733 人（王奇生，1992：28）。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学子纷纷辍学归国。1939 年，在美中国学生锐减至 1163 人（王奇生，1992：2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的国际汇兑渠道阻塞，留美学生的经费来源被完全中断。到 1942 年，仅有 987 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滞留（王奇生，1992：30）。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国尚有较强的实力接受外国学生，而且美国政府与蒋介石政府关系亲密，因此赴美留学的人数又开始上升。1948 年在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总计 2710 人，分布于美国 45 个州。（王奇生，1992：32）到 1949 年，中国留美学生比上一年增加了 40% 多达 3797 人，成为中国百年学生留美史上的顶峰（王奇生，1992：32）。

从 1949 年到 1979 年，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处于冷战状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到美国去留学的人数可以说是凤毛麟角。1979

年中美恢复邦交时，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只有 20 多人^①。自从 1979 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中国大陆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与日俱增。1990 年在美国大学学习的大陆留学生达到了 33390 人，占世界各国在美国留学学生人数的首位^②。到 1993 年底，中国大陆学生在美人数仍居第一，总共有 45130 人^③。与此同时，从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去美国留学的华裔学生也大大多于来自其他文化传统的学生。

100 多年来，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潮流时起时伏。随着世界政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学生去美国留学的人数和类别时有变化。总的来说，除了国内政治经济动态和国际大环境的变动以外，如果中美关系亲和，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人数就相对上升；如果中美关系疏远，去美国留学的人数就会相对减少。

二、人际关系理论

学术界的研究和我们的生活常识告诉我们，作为社会的人，我们都有和社会上其他人交往的愿望和需求。人际关系不仅是人类日常生存的必要和必然手段，而且可以满足个人之间相互交流思想和情感的需求。“人际关系”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一般被定义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各种关系”。在社会心理学中，大多将其定义为“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和行为倾向”（杨宜音，1995）

英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克特（Donald W. Winnicott）和美籍奥地利裔精神分析学家汉兹·克哈特（Heinz Kohut）等人从个体发展角度所进行的大量追踪调查表明，个体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生理上都需要他人才有可能生存和发展。人在刚刚出生时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婴儿是通过认识到他人（如母亲或最亲近的照顾者）的存在来认识自己的。从人的

① Thomas Fingar & Linda Reed, *Survey Summary, Students and Scholars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United States*, August, 1981, Washington D.C.: Committee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Foreign Student Affairs, 1981.

② Robin Wilson, *Foreign Students in U.S. Reach a Record 386,000* in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Number 28, 1990, Vol. XXXVII, No. 13, 1990.

③ *World Journal*, December 1, 1993.

发展过程来看,良好的社会人际环境是个体成长和发展的必要条件。^①美国人际关系学者斯蒂夫·达克(Steve Duck)、莉莲·罗宾(Lillian B. Rubin)和露丝艾伦·约瑟森(Ruthellen Josselson)等人对人类各种人际关系的研究表明,个人生活中所拥有的重要人际关系(如家人、朋友)对于个人的自我评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②。对个体具有重要意义的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个体认识自我和发展自我的重要参照系,个体的生命意义与他们紧密相连,通过与他们的认同而完成自己的社会化过程。一旦个体离开了自己植根于其中的关系网络,便会失去生命的重要根基。而失去这个根基,个体便会产生孤立无援或被排斥的感觉。^③奥地利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阿德勒(A. Adler)认为人的“社会感”是个人成长最重要的目标(阿德勒,1991)所谓“社会感”指的是一种同一感,一种个体对他人的兄弟般的感情。具有这种感情的人尊重同胞的存在,把他们的存在看成是目的本身,而不是对自己的威胁或者仅仅是为自我进取服务的工具。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认为,个体内在倾向的实现除了个体的“积极自我关注”以外还有待于他人对自己的“积极关注”(许金声,1988: 102—103)。“积极关注”是他人对自己的一种热情、敬重、喜爱和接受的态度。给予关注的人对于个体越是重要,如老师、父母、配偶和朋友等,个体就越能充分地实现自己的内在潜力。以上有关“客体关系和自我心理”(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方面的研究大大地发展了经典的弗洛伊德(Freud)的理论。^④这些研究表明,人的心理建构不仅仅由“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所组成,个体还需要“他人”(other)才能正常地生存和发展。

① (1)Michael St. Clair,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Monterey, Cal.: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2)Josephine Klein, *Our Need for Other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7.

② (1)Steve Duck,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s*, New York/London: the Guilford Press, 1991; (2)Ruthellen Josselson, *The Space Between Us: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2; (3)Lillian Rubin, *Just Friends: the Role of Friendships in Our Lives*,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5; (4)Letty Cottin Pogrebin, *Among Friends: Who We Like, Why We Like Them and What We Do with Them*, New York et al.: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1987.

③ Ruthellen Josselson, *The Space Between Us: Exploring the Dimensions of Human Relationship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92, p.180.

见 约翰·里克曼编 贺明明译:《弗洛伊德著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虽然人际交往是人类共同的需求，但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对“人际关系”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样，与之相适应的行为倾向也不尽相同。“人际关系”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于所有社会形态和历史时期的普遍现象，而且反映了各个文化中人们不同的社会生活和价值取向。中国社会心理学家杨宜音认为，西方“人际关系”的逻辑起点是西方意义上的“自我”（self），这一“自我”不仅蕴涵有“动力”（dynamic），而且具有“个体”，（individual）的意义（杨宜音，1995）。因此，西方人的人际关系是由具有这种特定意义的自我的个体之间所形成的心理距离和行为倾向^①。这种关系是通过个体之间进行“互动”而建立起来的，是一种“获致性关系”（achieved relationship）。个体可以有选择地与他人建立关系，而且受到社会契约观念的约束（杨宜音，1995）。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中最小的社会意义单位不是“个人”，而是“家”。中国人的“自我”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实体，而是“家我”（family-oriented self）。“我”不仅包括自己，而且包括对自己在家庭中相对位置的意识，对家庭中其他人位置的意识以及家中的某些人。由于“家”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单位，是先天赋予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以“先赋性关系”（ascribed relationship）为主。中国人人际关系的内容主要取决于彼此先定的身份形式，其选择性和契约性都比较低。如果交往双方不存在亲缘关系，却又希望建立深入的关系的话，便常常通过拟亲方式（如领养、结拜、认干亲）获得准亲属身份以及与其相应的交往内容。因此，中国人对“人际关系”这一概念的理解与西方人是很不一样的。

由于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对“自我”和“人际关系”等概念认识不同，他们在行为表现上也有所不同。很多学者认为目前人类的社会交往行为可以分成“集体主义”（collectivism）和“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两种倾向。社会心理学家霍夫斯特（G. Hofstede）认为，集体主义者的“我们”感很强，在组织中重视成员资格，对组织有情感上的依赖，依靠群体决策，忠于本集体的价值观念；而个体主义者在情感上独立于群体，

^① “西方”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泛的概念，我想杨宜音在这里指的是从古希腊文明中发展起来的所有文化形态。

强调个人的独立性^①。香港学者许志超 (C.H. Hui) 和美国学者特里安迪斯 (H.C. Triandis) 综合前人的研究认为, 个体主义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而集体主义则是以集体为中心的价值取向^②。其主要区别表现在: (1) 个体主义者认为个人是生存的基本单位, 具有自我独立的存在意识; 集体主义者认为集体是生存的基本单位, 个人从集体中获得物质和情感上的安全感。(2) 个体主义者较多关注自己的意见, 当个人目标和集体目标不一致时, 很少愿意服从集体的利益; 而集体主义者重视他人的意见, 常常服从别人特别是权威人物的领导。(3) 个体主义者愿意将冲突公开与别人对抗而集体主义者强调群体和谐努力避免正面冲突。(4) 个体主义者认为事情的结果主要是个人行为所至, 愿意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而集体主义者认为任何结果都是集体所为, 习惯于众人一起承担责任。

三、中美人际交往模式比较

跨文化研究表明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人际交往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不论是在价值观念还是在行为规范上都很不相同。很多学者如台湾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美国学者迈克·彭 (Michael Bond) 等人都认为, 一般来说中国人群体观念比较强, 比较看重人际交往中的人情和谐; 而美国人相对来说更强调个体主义, 主张人际关系中个人独立和相互竞争^③。中国人心目中的“人”比美国人更带有关系性, “人”不是一个独特的、孤立的实体,

① G. Hofstede, *Cultures Consequence: Intern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related Valu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80 转引自张志学:《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反省与更新》(载李庆善, 1993)。

② C.H. Hui & H.C. Triandis, *Individualism-Collectivism: a Study of Crosscultural Research i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86, 17, pp. 225 - 248.

③ (1) 李亦圆 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性格》桂冠图书公司, 1989; (2) [英] 迈克·彭等著 邹海燕等译:《中国人的心理》新华出版社, 1990; (3) Robert Meade & William Barnard, *Conformity and Anticonformity among Americans and Chinese*, i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73, 89, pp. 15 - 24; (4) Paras Nath Singh, Sophia Chang Huang & George Thomps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elected Attitudes, Values, and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American, Chinese, and Indian Students*, in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62, 57, pp. 123 - 132; (5) Joseph Tobin, David Y. H. Wu & Dana H. Davidson, *Preschool in Three Cultures: Japa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6) Harry C. Triandis,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Theory* in C. Kagitcibasi, (eds.), *Growth and Progress in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Berwyn: Swets North America Inc., 1987.

而是生活在各种人际关系之中的实体。“自我”与他人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我”的社会需求只能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在与社会规范的一致中得到满足（迈克·彭，1990）中国人的“自我”是某一群体中的一员，如家庭、邻里、学校、工作单位、国家，乃至宇宙。因此，美籍华裔文化人类学家许琅光（Francis Hsu）认为，西方人常用的一个表示人的特殊属性的术语“personality”（人格）不能贴切地表达中国人概念中对“人”的解释^①。“人格”主要指的是个人内部的品质，而汉语中的“人”是以个人与其他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前者使用的是“托勒密”规则，把个人视为世界的中心；而后者使用的是“伽利略”观，从整体来看待个人。汉语中的“人”是一个人际概念，与社会中其他的人密切相关。当中国人说“某某人不是人”时，并不意味着这个人不是一个人类动物，而是说他的行为不被他人所接受。由于中国人概念中的“人”包含了他人，所以中国人具有一个与自身亲密无间的社会文化机制，这一机制可以为中国人提供比美国人更稳定的“心理自动平衡”（homeostasis），使他们从重要的他人那里获得认同和支持。相比之下，西方人除了求助于内部自我以外，必须通过更为多样化的方式来控制外人和别的世界（如探险、商业垄断、收集古物、帮助穷人等），以此扩大个人的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的形成上，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一般产生于自己的家人、同学、同事和同乡中^②。中国人的友谊通常可以延续一生，对友谊双方的个人生活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深厚的友谊包括如下品质：对朋友关心、关切、关注、宽容、忍让，朋友之间相互信赖、忠贞不渝。（Zhang, Xiaoping, 1990）美国学者朱高文（Godwin Chu）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一种“情感关系”（affect relations）。这种关系带有浓厚的“人情味”，其维持手段主要依靠人的感

^① Francis L.K.Hsu(许琅光), *The Self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in Anthony J.Marsella et al.(eds.), *Culture and Self: Asian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New York &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85.

^② Bruce J.Jacobs, *The Concept of Guanxi and Local Politics in a Rural Chinese Cultural Setting* in Sidney L.Greenblatt, Richard W.Wilson & Amy Auerbacher Wilson eds., *Social Interaction in Chinese Society*, Praeger Publishers, 1982.

觉而不是某种操作工具。^①而西方典型的人际关系是一种“角色关系”(role relations),建立在执行任务和交换服务中所表现出来的权利和义务之上。和西方人的关系相比,中国人的“情感关系”更具有血缘家族和拟亲倾向。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地寻找“人情”,并通过层层家庭和群体人际关系网建立和保持情感上的交流。

虽然学术界沿用西方的概念,倾向于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具有“集体主义”取向,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美籍华裔学者余英时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既不是“集体主义”的也不是“个体主义”的,而是“个人主义”(personalism)的^②;在中国社会政治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所强调的“为仁由己”和人伦秩序都是以个人为中心而推广出来的;“礼”虽然有重秩序的一面,但其基础却在个人;虽然儒家要求的是一种比“法”更高的“公平”和更合理的“秩序”,但是这种理想的出发点却在个人;“礼”或人伦秩序要求照顾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因此中国人“散漫”如“一盘散沙”缺乏集体主义精神。

人类学家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每个人都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地向外扩散出类似同心波纹的关系网(费孝通,1985)。许琅光(Francis Hsu)认为中国人的社会行为具有情境取向(situation-orientation)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人们往往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境采取相应的态度和行为^③。由于中国人看重关系的亲疏远近,他们在人际交往中遵从的是“内外有别”的原则(费孝通,1985)。他们特别重视双方的相对社会关系,并以此来选择适当的互动方式。虽然中国历史上响

① (1)Godwin Chu(朱高文),*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in Godwin Chu(朱高文)& Francis L.K.Hsu(许琅光),(eds.)*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2)Francis L.K.Hsu(许琅光)& Godwin Chu(朱高文),*Changes in Chinese Culture: What Do We Really Know?* in Godwin C.Chu(朱高文)& Francis L.K.Hsu(许琅光),(eds.),*Moving a Mountain: Cultural Change in China*, Honolulu: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1979.

② 我个人认为这些争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受到现有语言的限制。由于“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对立首先是由西方人提出来的,一般将中国文化纳入“集体主义”的范围,结果使问题的讨论限定在这两个概念之中。余英时提出的“个人主义”的概念对我们了解中国人的行为模式很有帮助,可是“个人主义”这个词语已经带有浓重的西方味道,而且常常与“个体主义”相混淆。因此,我认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找到一个本土概念来恰当地描述我们自己。在本书中,为了避免歧义,我使用的是“群体中心”或“群体本位”之类的词语。

③ Francis Hsu 许琅光),*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 Essays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起过墨子不分亲疏远近的兼爱论声音（焦国成，1991：178），但中国社会主要是建立在儒家的君臣等级制度和观念之上的。一般来说，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往往按照“自己人”和“外人”的分界来进行区别对待。凡是与自己有“关系”的人就是“自己人”，而那些没有“关系”的人便是“外人”。从字面上看，“有关系”含有“要紧”的意思，“没关系”就是“不要紧”、“无所谓”。因此，对待“要紧”和“不要紧”的人，自己的态度自然也就不同了。（张老师月刊编辑部，1990）“自己人”凡事好商量，而“外人”则一切照章行事。“关系”除了角色地位以外还具有“交情”的含义。当我们说“这个人的关系不错”时，我们指的是他认识很多人，和别人有交情。

中国人的人际交往不仅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和自然人情味，而且具有强烈的道德判断意向。美国学者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借用美国心理学家卡罗·季丽根（Carol Gilligan）的术语，提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关心的伦理”，（the ethics of care），而美国文化则是以“自主的伦理”（the ethics of autonomy）为主导^①。他认为：“中国道德文化中的个人视他人的利益为人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原则。这种道德文化发源于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共情的培养是人际关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②。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化是“伦理的人文主义”，即“个人与个人，以对偶关系，而求助于其生命心灵中真实存在之伦理主义。它可以超越于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李宗桂，1988：323）。

四、跨文化交流理论

自从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Kalvero Oberg）于1960年首次提出“文化冲击”〔又称“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这一概念以来，跨文化研究一直在使用这个概念对外国人的文化适应问题进行追踪调查（关世杰，1995：340—341）。“文化冲击”指的是“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

Richard W. Wilson, *Moral Culture and Chinese Culture: Patterns of Harmony and Discord in Proceedings of CCU-I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oral Values and Moral Reasoning in Chinese Societies*, (1990), Taiwa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Psychologists, May 25–27, 1989.

同上书，第10页。

号和符号，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这种焦虑可以在生理上反映为持续不断的身体上的疲劳感、长期的精神压力、对失去熟悉的食物和伙伴的不适、对东道主的反感、对自己价值观受到亵渎的不满、对自己的角色身份产生混乱而感到的不舒服、对自己应付环境的无能感，等等。在跨文化交流中，文化冲击的强弱，其明显程度往往与家乡文化和东道主文化的差异大小成正比。有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差异较中国与印度、日本和新加坡要大，因此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比到其他亚洲国家留学所受到的文化冲击要大一些（关世杰，1995：57）。

文化冲击大体经历四个阶段：蜜月阶段、沮丧阶段、调整阶段和适应阶段。这四个阶段的变化过程一般呈“U”形曲线。蜜月阶段大约持续一到两个月，在这段时间里，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往往表现出对周围事物有强烈的新奇感。然后便进入沮丧期，这个时期约三到四个月，在这一时期，外国人的新奇感逐渐消失了，开始感到异文化对自己日常生活造成的种种不适；他们有一种挫折感，觉得自己与眼前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在第三阶段，他们开始对自己的精神和行为进行调整，逐步走出了情绪的低谷。在第四阶段，他们已经基本适应了异国的生活，又开始对周围的事物感到新奇和有兴趣了。当然，这个“U”曲线的具体表现形式因人而异而有所不同，文化冲击的轻重程度也因人而异。

除了“文化冲击”理论以外，跨文化交流学者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理论来对外国人的交流适应问题进行探讨。像“文化冲击”理论一样，金·扬（Young Yun Kim）提出的“适应理论”（adaptation theory）也从动态的角度对个体在异文化中的行为表现进行了分析^①。金·扬认为在跨文化交流中，一个文化中的个人或群体向另一个文化学习和调整的发展涵化（acculturation）过程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表现为压力—调整—前进这样一个动态的形式。这个过程像一个螺旋式的弹簧，进两步退一步，在压力下逐步向前推进。如果涵化者感到有思想压力，他就会后退一步，进入一种减少压力或放松的状态，以应付旧的认知模式的失败。在这个防御

^① Young Yun Kim,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lefi Kete Asante & William B. Gudykunst, eds., Beverly Hills, CA, USA: Sage, 1980.

性阶段，涵化者重新组织其认知模式和情感，积聚力量向适应方向再进行一次新的尝试。如此螺旋式向前推进，不断地涵化于异文化。个体涵化的快慢程度取决于个体在异文化中人际交流的能力、交流密切程度、与本文化保持社会交流的程度、异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容纳性，以及个人涵化异文化的态度、素质、开放性和精神恢复能力。个人对异文化的态度一般有四种：同化型、排斥型、边缘型和整合型。

跨文化研究除了对外国人文化适应的动态过程进行探讨以外，还对他们在跨文化交流时的思维方式进行了研究。很多学者都发现人们在对自己的文化以及在对别人的文化进行评价时通常使用一些先人为主的“定型观念”〔又称刻板印象 (stereotype)〕。^① 定型观念可以分成自定型和他定型。一个群体对自己文化的定型观念称为自定型，对别国文化的定型观念称为他定型。通常，人们对别国文化的定型观念往往是在自己有限经验的基础之上由间接渠道获取信息而形成的。由于对别文化不甚了解，人们往往无意识地用自己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和评判别文化人们的行为。人们大都成长于单一文化环境，潜移默化地受到本文化行为准则的熏陶。他们对这些准则往往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在跨文化交流时便无意识地将这些准则用来衡量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行为。由于大多数人对自己熟悉的文化总是有所偏爱，当别人的行为与自己习以为常的准则不相符时，他们便对别人的行为给以负面的评价。这种以本民族文化模式为基准来评价其他民族文化的心理倾向往往使人们对异文化产生先人为主的成见和偏见。与此同时，人们对本国人的定型观念几乎都是正面的。对这种现象有两种解释：第一，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动机性的积极偏见，即处于维护自己国家国民形象的心理，将本国人描述为优秀的人；第二，也可能是出于一种非动机性的积极偏见，将自己认为优良的人格特质投射到本国国民身上。

定型观念的形成除了有以上提到的文化差异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一定的深层心理认知机制（关世杰，1995）。首先把定型观念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指出，世界上的事情太复杂，没有人可以对所有的事情逐一地亲身去体验和认识。为了节省时间，人们便发展出一个简化的认知方法，将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塑造成一定的形象，凡是属于这个群体的成员，就被纳入这一形象中。定型观念往往走在

韩向明：《北方沿海省市居民国民刻板印象的调查研究》（载李庆善，1993）。